

佛利民在中國

米爾頓・佛利民



佛利民在中國

米爾頓 · 佛利民

香港經濟研究中心



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 1991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ISBN)：962-201-503-4

香港經濟研究中心叢書

著者：米爾頓·佛利民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承印：騰步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道好景工業大廈

HKCER Paperbacks

Friedman in China (in Chinese)

By Milton Friedma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01-503-4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Shatin, N.T., Hong Kong
Printed in Hong Kong

前 言

以一個共產國家自發的經濟改革來說，中國於1979至1988年這十年間所着手進行的，無疑是一次雄心萬丈兼且影響深遠的嘗試。某些觀察家甚至認為中國的改革終會導致資本主義制度的誕生，但大部分人並不如此樂觀。畢竟，沒有一個共產國家在下放經濟決策權方面獲得成功。在此以前屢次經濟改革的嘗試，都以重新堅持中央控制收場。

在這段歷史性時期內，佛利民夫婦於1980年及1988年間先後兩度訪問中國。訪問期間，他們獲悉經濟改革的情況，並與中國人民分享他們的經濟學識和卓見。佛利民教授曾在許多他們到訪過的中國城市演講，並跟政府官員、工廠經理、銀行職員、學生、教授等討論；甚至和一般老百姓在街頭、在他們家中談話，交換意見。作為不懂中文而逗留時間有限的外國訪客來說，他們對中國事情的複雜和困難能夠明白及理解，這足以令人佩服。本書就是他們在中國的活動和感想的一個紀錄。

張五常教授除了給佛利民夫婦報道中國近期各種情勢的新發展外，並為他們安排第二次訪問中國的行程，且親自作伴。這次訪問最令人矚目的，當然是佛利民與當時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的會面。在那次非常難得的機會中，趙評述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就與挫折；他對中國經濟問題之了解及所提解決之道，給佛利民和張五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改革能否克服既得利益者的政治阻力，他們

較不樂觀。翌年，天安門事件所引起的危機爆發，趙隨即失勢下台。

儘管中國經濟改革的未來路向陰霾四布，佛利民對其長遠的展望則仍具信心。這集子內諸篇，收集了他對計畫經濟制度改革的觀察，亦即他對這個問題的寶貴貢獻。正當世上許多國家謀求改革他們的經濟制度之時，《佛利民在中國》一書出版。因此，不單止對關心中國形勢的讀者，就是對希望從中國的成敗中吸取教訓的人士，本書都具有相當價值。

王于漸寫於
1990年3月

作者自序

天安門廣場的悲劇，給數以千萬乃至數以億計的人，帶來鉅大的創傷。好些人失去了生命；更多的人失去了人身自由；而所有人都被剝奪了憑自己意願去選擇個人生活方式的權利。這齣悲劇並沒有改變中國所面對的經濟現狀，反而使少數人享有特權而多數人受苦的中央計畫經濟成功過渡為快速增長、繁榮得以共享的市場經濟這個任務更加困難而已。

時至今日，還沒有一個共產國家過渡成功。中國能否開其先河？這可能性引起了我和內子的好奇心，使我們在九年前接受了邀請前往中國訪問三星期，歷遊北方的北京與長春以及南方的上海、蘇州、杭州和廣州，並曾往許多出色中國畫所描繪的旅遊勝地桂林。我在上述很多城市中對受邀前來的聽眾發表演說，並且在政府人員的辦公室、在工廠、在銀行，甚至在普通家庭裏，跟人們進行非正式的討論。自始至終，我們都受到最熱誠和友好的款待，東道主盡一切努力安排我們和各行各業不同類型的中國人接觸。對於我們碰到及結識到的個別中國人來說，他們實在讓我們懷着一股溫馨離去；對那廣大人民的苦況，我們寄予極大的同情；而未來究竟會給中國帶來甚麼，我們的感覺則頗為複雜。

我向共同資助我們該次旅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和美中學術交流協會提交了一份報告書。讓我重引該報告中的幾段話來說明我們當時的看法。一開始我就指出，我們所得

的典型經驗，「（在人民方面）非常的親善；（至於機構方面）在小者言則效率井然，在大者言則官僚架構龐大及極端缺乏效率。」在這裏我節錄報告中的數段話來概括：

就絕對的水平而言，中國的經濟非常貧窮和落後。龐大人口中大部分以耕作爲生……工業生產水平極低。建築物的維修水平，跟我們在所有其他共產國家見到的同樣可憐——即使相當新的樓宇，看來也像日久失修而顯得殘破陳舊。步行或駕車在路上隨意觀察，得到的印象是簡陋、晦暗、單調和骯髒。衣服款式高度劃一，差不多每個人都穿着無樣式的褲子與毛裝上衣。舞台幾乎是唯一可以找到有光、有美感，並且是清潔和有式樣變化的地方。

雖然人們不斷將印度拿來相提並論，但兩者之間頗有重要的差異。最明顯的是：在中國你見不到在印度街頭流浪的乞丐，同時貌似饑饉或衣衫襤褸者亦難得一見。……

若不論當前的水平而看進度，情況則較爲複雜。過去三年左右，經濟情況無疑有顯著的改善。中國人歸功於顯然在主持大局的鄧副總理的「務實」政策。

我個人的看法則稍有出入。在混亂後恢復秩序的社會，其經濟能夠產生快速的改善，人所共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德國和日本迅速復元，可爲明證。隨着內戰結束和毛的勝利，更加上惡性通貨膨脹得到遏止，中國的經濟水平也曾快速跳躍上升，但並不持續。跟着，毛的一連串實驗，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再一次帶來了一段空前的混亂和秩序失控時期。光就毛死後社會秩序的恢復及

鄧重新取得權力這點，就足以讓經濟元氣得以回復並增長。我認為，比諸大部分仍停留在公文來往階段的鄧小平改革，這才是更根本的解釋。

改革方針：如開放跟西方的接觸、嘗試引進市場因素，鼓勵外人投資及其他等等，都向着可取的方向進行。但改革的推行與其成效是否經得起考驗，現尚言之過早，而部分開始時人們曾寄予厚望的改革侈談已逐漸消逝，尤其當一些與外國人合作的計畫無法不削減的時候。

中國的潛力是巨大的。她目前極低的經濟水平，倒不能諉於國民特性或缺乏自然資源所致。畢竟，要反證這些理由，我們祇需看看在新加坡、香港和臺灣等地的華人的成就——與中國大陸相比，他們的資源更缺乏。為甚麼在本土外其他地方的中國人都能活得好好的？故一定是在經濟活動的組織與控制方法上出了岔子，而這個解釋，可由別的共產國家低生活水平加以佐證。因此，如果能够在組織和控制經濟活動的方法上改轅易轍，則取得像日本、德國及較近期的智利所獲得的經濟奇蹟，也是有可能的。

我個人的揣測是，當一些新宣布的政策能漸漸實施，則以後數年可以見到相當的進步。然而對於這種進步是否可以長期繼續下去，我抱悲觀態度。開放體制牽涉到權力和責任的分散；對中央集權的政治架構來說，這會威脅到它的安全，而它很可能把體制重新封閉。

共產黨統治中國的特性，終究可以形容為在較為靈活與再度僵化之間搖擺不定。文化大革命式的

極端過度行爲或許未致重現，但權力鬥爭會繼續下去。創傷不會全部得到復元。不管情況怎樣，人的野心和欲望存在，而政治是唯一發洩的途徑。

以後八年，我們全賴跟中國的學生和老師、香港的友人、在華的美國學生及新聞媒介等的聯繫，得知中國的消息。看來中國改革進程的速度和成就，超過我們所想像的，這便引起我們前往一看究竟的好奇心。因此，當CATO研究所和復旦大學在上海聯合舉辦一個有關改革的會議時，我們立即趁機接受了復旦大學的邀請，重訪中國。

這難得的機會，令我們再度可以在一段相當短暫的時間內，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較深入的觀察。這得感謝復大和CATO所安排會議的成功（與會過程和宣讀諸論文將分別以中英文出版）。能够說服從前是我學生、現在是我朋友張五常跟復大合作，安排我兩到上海以外的地區參觀，並結伴同行，實在頗為幸運。五常過人的精力、對中國現況的深徹了解及在中國的聯絡網織成了一次令我倆增益不少的旅程。

對所見的事物，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前在一些偏僻地區，差不多只在小範圍內賣農作物的少數自由市場，都已發展到不光是零售，並有批發給小規模私人企業的代理行業，售賣多樣不同的產品，成為更擴大的自由市場經營。除了中外合資的國際酒店外，大城市建築物的維修並未見改善，但人們的衣着再不是千篇一律，色彩與樣式變化已從舞台伸展到街道上。和以前相對比，我們發覺，人們現在更願意公開表達意見。還有，能懂和能說英語的人數在大量增加。在一場面對三百多四百名復大學生的演講會上，雖然沒有翻譯員，但從面部表情和所提的問

題看來，他們顯然明白內容，這令我感到驚訝。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們在較小的鄉鎮明顯見到的企業活力與發展。1980年我們到訪中國時見到的差不多全是農業經濟，有些已發展到相當的工業化。據悉接近50%的零售生意透過私有市場進行貿易的。就我們所見的鄉鎮企業快速成長來看，這個數字頗為可信。此等企業大部分由政府資助或管理，但屬地區而非中央政府，故仍需受到競爭壓力。重要的是權力下放與競爭；最理想當然是純私人企業間的競爭，但讓權力分散的政府單位之間競爭總比完全沒有為佳。

本書中的一章描述我們這次訪問的高峯——與趙紫陽的會面（第九章將那次會談一字不易的轉述）。趙顯然對中國面臨的經濟問題非常了解，並有解決之道。

他講話中最重要的一點，在「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那不可能。國家是一個從上而下的組織，而市場則剛好相反；兩個原則並不兩立。國家和市場可以各自調控部分的經濟，但趙所提的組合方法，並不可行。

趙的老練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我因而相信他確實認識到所存在的矛盾，但為了政治的權宜考慮必須作出姿態。值得一提的是，他不曾說那是他自己的想法而是「黨十三次代表大會」所決定的。他並沒有表示對該決策同意與否，只作事實鋪陳，然後轉到其他話題。類似這般但較不明顯的政治姿態，在我們整個對話中屢屢出現；雖然，好些出人意表的獨立見解亦混雜其中。在芸芸衆語中最引人注目的——起碼我覺得最堪玩味的——是他談到鄉鎮政府企業時的話：「我不能說他們這種所有制同西方企業私人所有制哪個有活力，……」

對話前的夏天，經濟改革的直接控制權被轉移到李鵬手裏。在較不着痕迹的政治層次而言，我在對話完畢離場

時相信趙是同意我的。那主要並非他要聽我的見解，而是他希望收復不久前的失地的政治策略一部分。這似乎亦是他要英文《中國日報》的一位記者及其他幾位專責經濟計畫的高級官員在場的原因。對話始終都是趙和我通過翻譯員進行的，但不論當時或現在我都不相信，會談的效益純是爲了我們之間的意見交流而已。

在談及的各個題目中，我們沒有甚麼意見分歧，因爲所論及的全限於實證性而非規範性的問題。無疑，如果我們能夠將當時的討論範圍擴展到一些如人權、政府所應恰當扮演的角色、政治制度等等規範性問題，則較大的歧見會出現。但該等題目不在議程上，大家當可心照不宣。我以專業經濟學家身分被邀，不是政治哲學家。

不管上述的看法有多少屬實，五常、內子和我離場時懷着的那一股樂觀與熱情，給日後的發展和趙紫陽的倒台等事件，弄得甚爲沮喪。過去五十年間，不論是在共產與非共產國家，我所碰到的政府高官當中，他是與別不同、給人印象難忘的一位領袖人物。就以所面臨的困難及如何克服它的清晰理解上，與追求這目標的明確誠意上，他跟別的很不一樣。現時他已失勢，但他還有影響力，而這對將來的發展，會起一定的作用。

曾經在報紙刊載、現重印於書末的一篇文章中，我估計了天安門廣場屠殺後可能產生的短線經濟後果。長遠後果則不易洞察。我相信，邁往市場控制經濟運作的趨向，遲早會重伸步伐。但這會在一年後抑或十年後才出現呢？在這之前，會不會先有斯太林式或毛式的壓制，令少數特權多數受苦維持一段長時間呢？沒有人能掌握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希望這段時間不會長，但希望歸希望，現實往往是另一回事。

當我重讀在上回訪華後所寫報告中的揣測時才體會

到，自己上一次的預見，比起這一次再度訪華後所帶回的審慎樂觀，實具先見之明。讓我覆述一遍：「開放體制牽涉到權力和責任的分散；對中央集權的政治架構來說，這會威脅到它的安全，而它很可能把體制重新封閉。」很不幸的，事正如此。

米爾頓·佛利民

1990年2月1日

於加州 史丹福

譯 序

1988年杪，王于漸先生徵得佛利民教授本人的同意，計畫出版《佛利民在中國》一書，並提議由我負責編譯工作。當時覺得很有意思，立刻開始着手進行。後來因種種原因，出版計畫擱置起來。一年後決定出版，除了編排與章數跟原稿略有出入外，其他大致依舊。為讀者能清楚明瞭各章安排起見，在此作一簡單的介紹。

全書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第一至第四章）乃佛利民教授1980年在中國的演講稿。原文曾由藤茂桐君、虞關濤君及周林君等譯出，由於圖表不全，同時偶有錯漏，所以根據英文原稿逐句逐段詳為增訂補充，重新刊行。

第二部分各章與佛利民教授1988年再度訪問中國有關。首章（第五章）根據馬之驕君的藍本增刪修訂而成，乃佛利民教授在上海復旦大學的演講稿。張五常教授大文〈背影〉（第六章）及第七章、第九章皆曾刊於《香港經濟日報》。第七章的演講和問答兩部分在報上發表時，對原稿本略有刪節。現譯者援用當時的即場錄音帶，將譯文重新潤飾補充，以饗讀者。第八章乃佛利民教授與前任總書記趙紫陽會面前致送給他的一份備忘錄，並交由我們首次譯出發表。

第三部分英文原稿，曾於去年6月22日刊於美國三藩市的 *San Francisco Chronicle*，可看作全書的回顧和總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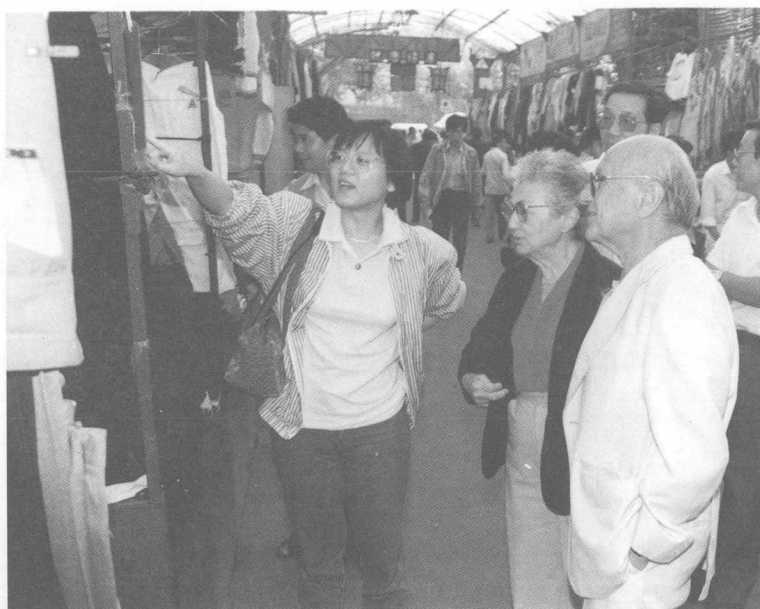
編譯過程中王于漸博士的不斷鼓勵、中文大學經濟學系陸炎輝博士撥冗相助，在此一併致謝。

鄧文正識

1990年夏



在蘇州市郊訪問鄉鎮企業



攝於蘇州一自由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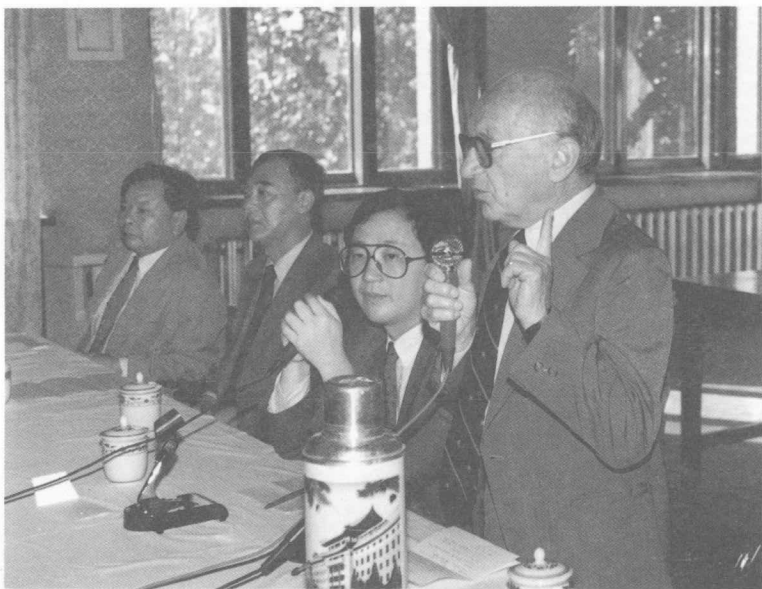
佛利民夫婦在無錫街頭買香蕉



攝於釣魚台國賓館



與馬洪及其他研究人員攝於人民大會堂



在北京演講